

用生命书写爱的忠诚

□何建明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这期间出版的作品很多，湖南女作家余艳的报告文学《板仓绝唱》，是最让我感动和久久不能平静的一部作品。读这部作品是在出差的飞机上，整个飞行路途上我的思绪和情感跟着作者的情绪进入了一个相隔已久、却又仿佛就在眼前的那段犹如自己的一位好姐妹的情感纠结之中……那情太深、太苦、太悲壮、太凄美！

这样的感情故事发生在一代伟人毛泽东和他的结发妻子、革命烈士杨开慧之间，也许在特殊人物身上发生的特殊爱情与婚变没有错与对之说，然而，谁来评说这历史？至少应该让历史和公众了解一些吧。

这也许是作者在得知和获得杨开慧当年秘密藏于湖南板仓老宅“墙洞”里那份洋洋万言的手稿后，内心一直在翻腾的一连串想说的话、想吐的情。

于是，3年前早春二月的“一个难得的艳阳天”，一个湘妹子提着一大袋子书籍，开始了对另一个湘妹子情感的探秘历程……

这份历程是痛苦的、揪心的、同情的、悲切的，甚至是异常无奈的，但又必须是清醒的、义无反顾的和彻底俯底的，否则，作家感觉自己对不起默默死于刽子手屠刀下的毛泽东的“骄”——一个知性的、为毛泽东生了3个儿子的女人，她眼巴巴地听说自己的男人已经娶了另一个女人，却依然毫不犹豫地支持他在井冈山继续领导革命队伍与反动派作殊死的斗争，最后又不得不像红霞一样散落在一片血色的黄昏中。

为了找到当年杨开慧写那份洋洋万言的“绝唱”时的感受，余艳独自一人，呆呆地在当年杨开慧写下这份万言“情书”的小黑屋里整整坐了一夜，这一夜让她真切地体会了杨开慧那份撕心裂肺、百般无奈又必须清晰明了的感情纠结：“我哭了，多次默默地陪一个早已在83年前就死去了的湘妹子、一个有3个儿子的母亲、一个刚刚送别了父亲的女儿、一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男人挽着另一个女人的手远走了的妻子哭泣流泪……当我第二天走出那个小屋儿时，我的灵魂和身体仿佛都与一个人融在了一起，并且走进了同一个情感通道之中。这个人就是杨开慧。”余艳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她。

《板仓绝唱》讲的是毛泽东妻子、革命烈士杨开慧带着3个儿子、独自在长沙老家的板仓苦苦等待秋收起义后上到井冈山的女君毛泽东时，隐隐约约听说自己的丈夫身边有了贺子珍，最终在苦楚难尽的情感纠结之后写下了万言书时的情感故事，读后令我全身热血沸腾、思绪久久难平，这是因为：杨开慧作为一个母亲的苦、作为一个孤守丈夫的妻子之苦、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无奈之苦！这个“苦”字其实何足道尽杨开慧的内心感情巨澜？“说到死，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这是杨开慧自己写下的话，死是她喜欢的事？一个正当年的女人，怎能有这样的心态？在“身边的战友、朋

友、亲人、闺蜜一个个倒下，激起仇恨的同时，也激起她非常的革命斗志，而让她义无反顾——赴死？还是焦虑、担忧、疲惫、躲藏，一个女子，柔弱的身躯，想尽快结束这馬拉松式的折磨？”这是余艳的疑问。

作者在寻觅答案。

“无论怎样都睡不着……总是不见来信”。这是杨开慧吐露的一丝“原因”，真正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此。余艳以女性作家的特有敏感嗅到了这一点。

“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杨开慧的心扉开始猛然开启——她要到井冈山去，去那里干什么？

毛泽东初上井冈山时，一次政治失意的打击使他病倒了。就在他病倒的时候，当地一个漂亮的19岁少女走到了他身边，整日陪伴他，为他治腿伤，更是在治他心上的伤痛……久而久之，两人走到了一起。

“太难过了，太寂寞了，太伤心了！这个日子我检（简）直想逃避它。但为着这几个小宝，我终于不能去逃避。”这是杨开慧留在万言书里的话。一个名正言顺的妻子和膝下有3个儿子的母亲，听说这样的事后能不难过、能不寂寞、能不伤心欲绝吗？

她又似乎什么都不知道。当毛泽东就在此时托人带回口讯说：“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这是暗语，就这封信，又让杨开慧激动不已，她这样描述：“他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下来了……只有五十天，幸甚天保佑我接到了那贵重的信。”

多情加痴情的妻子好像又忘却了所有情愫，她托堂弟杨开明捎去两坛豆豉辣椒和亲手做的两双布鞋给井冈山上的丈夫毛泽东。据说，毛泽东接过妻子辗转送来的布鞋时，沉默良久。但井冈山的艰难岁月已经不再让毛泽东顾此及彼了，他只能顾及一方而痛弃一方。

关于发生在井冈山上的“毛贺之恋”，在过去的党史和普遍的传说中，是毛泽东为了弱小的红军在井冈山上站得住脚，“不得不勉强同意”与贺子珍的联姻。

在阅读和分析杨开慧的“万言书”后，余艳认为，以往的这种解释和判定是错误的。她认为，“毛泽东素来反对没有爱情的结合，以他决不屈从的性格，他会为了两个山大王而让自己的婚姻打上政治功利的烙印？”

换句话说，毛泽东绝对不可能以牺牲自己的爱情而搏得政治上的暂时胜利。余艳进而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其实，毛泽东之间的这段姻缘，完全没有必要去刻意放大或刻意缩小或刻意遮掩。在毛贺之恋的故事中，我们可能无法淡化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井冈山根据地，正处于革命的低迷阶段。当时的工农革命军，并不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而是从一个挫折走向另一个挫折。在前有豺狼后有虎豹的险恶环境里，同志之间的相帮相扶已成最后的生之希望。在那艰苦卓绝的岁月中，毛泽东身体衰弱情绪低迷之时，一位纯洁深情的女战士来到了被开除党籍的毛泽东身边，对落魄的

■评 论

■新作快评 范小青《五彩缤纷》,《长江文艺》2013年11期

别一种「赤字」

□子川

范小青的小说《五彩缤纷》写了一个不那么“缤纷”的故事。小说塑造了两对遭遇相似的患难恋人。他们出生于农村，受过高等教育，都在城里打拼，先合租同居，再未婚先孕，然后又都为了腹中孩子的合法身份结婚，而前提又都是必须买房。

尽管小说没有耸人听闻的故事，但当一对患难恋人为了意外怀上的孩子，硬着头皮试着买房时，却突然被告知：“我已经有房了。”云遮雾罩的背后，原来是还有另一对恋人，与前者几乎一样，他们也是因为意外怀孕而打破合租同居的平静生活，奔波于按揭买房的现场。

两对恋人的奔波，都是由于他们有了一个意外出现的孩子，这个孩子都在等一个合法身份，而给孩子合法身份的前提是领结婚证。偏偏这两个不同的女性给出办证的前置条件又都是买房。严峻的现实是，十月怀胎的孩子不可能等更多时间，因此，买假身份证、办假结婚证，这些不端行为都出现了。沿着小说进程，“我”终于找到冒用“我”身份的买房人，也终于弄清对方为何冒用我的身份，竟发现：“苍天，怎么跟我的事情越来越像，我心头竟滋生出一些恐惧，下意识地朝她看看，我是不是该怀疑她是我老婆扮演的那个人？”

感叹归感叹，肚子里的孩子却只能给大人10个月时间。当“我”用快跑的速度把冒用“我”身份的问题解决掉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而且，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新的购房政策公布了：“到了售楼处，我就颁布了新的条例，单身不能在本地买房，除了要有本地本单位的证明，最重要的是要结婚证。我说，我还没结婚呢。他们说，那你先结婚嘛。我说，没有房不肯结婚呀。他们说，不结婚不能买房呀。”另一边，“我老婆才不理睬我的战略战术，她才不和我对嘴，她沉得住气，原则性强，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话，按原先说的办，不买房，不领证。”这是一个悖论。老婆说：办证必须买房，而政策说：不结婚不能买房。小说写到这里，似乎山穷水尽，却看不到柳暗花明。

小说结尾，“我”老婆生下一对双胞胎，“我”给他们取名：吴一真、吴一假。关于吴（无）一真与吴（无）一假，不难理解。小说作为一种虚构的艺术，人物故事均来自虚构，自然“无一真”，但小说所概括、提炼的生活内容，一旦被升华为一种艺术的真实，就更深刻地揭示生活的真实，这便是“无一假”。真真假假让人眼花缭乱，以至于难辨真假，因此，无一真与无一假，实在也是生活中常有的事。

小说中的人物是虚构的，但像“我”这样在城市里打拼的农村青年却比比皆是。城市化进程把所有人都逼成了“刚需”一个群体，逼他们透支几十年生命去供一个甚至不去住住房。“她说出来的台词，吓了我一群人，你以为我急着买房子是急着要住吗？我奇了怪，不急着住干吗要急着买？”不为了住，却宁愿透支几十年的积蓄去买房，这种逻辑是不是很荒唐？这种荒唐的逻辑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小说家范小青写的是生活。生活的逻辑是鲜活的。在小说中，我们看到，自老婆意外怀孕开始，“我”拗不过，只能顺从老婆的意思去买房，而我的身份证已经被别人盗用，因此想按首套房政策买房，得想方设法先找回自己的身份，好不容易找到了冒名者，原来也是如我一样的一对年轻人，不仅如此，“由此我又联想到，在这座城市之中，在许许多多的城市之中，在苍穹之下，还有多少和我们的日子相差无凡的女人呢”。因此，当我们看到那两对患难恋人到处奔波，努力去借贷买房时，别以为这只是他们个人的“赤字”。

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出，这个不长的小说，其实有更大张力，有更浩茫的东西蕴含其中。小说题目为何要用“五彩缤纷”这个大词？开卷时我想过这个问题，捲卷时便豁然开朗了。小说固然迭起起伏，曲折迂回，不乏缤纷之象，但作者用“五彩缤纷”来做标题，其实有一种反讽的意味。难道不是吗？今天，当我们走进任何一座城市，都会看到尘土飞扬后的高楼大厦，看到霓虹灯下的灯红酒绿，高铁轨道、高速公路从曾经种植庄稼的田野上蛮横地切割过去，满目都是种种奢侈、浮华，不乏夸张的人和事，怎么也当得起“五彩缤纷”吧？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人民文学创作培训学校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3年11月1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人民文学创作培训学校

毛泽东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爱。对当时的毛泽东而言，贺子珍的出现，犹如沙漠旅人在干渴之时看见了一泓清泉，其实这就够了。”

这是女作家的认识，这也许是一个全新的解释，提供了毛泽东为何在尚知自己的妻子没有死时与另一位女人——贺子珍结合的全部理由，这是特殊时期所产生的爱情。然而，这样的爱情对杨开慧来说绝对是一种无法解脱的痛苦与绝望，因为她是妻子和3个孩子的母亲，她是深爱着丈夫的年轻女人。

“绝唱”由此而出，由此而变得凄苍与悲凉。

《板仓绝唱》首次公开了杨开慧牺牲前所写的“万言书”以及所写此书时的种种情感纠结，同时又回忆了她与毛泽东恩爱十余年的曲折情感和革命斗争故事，是近年报告文学创作中极其罕见的优秀作品，无论从它的史学价值，还是它所呈现的那种凄美的叙述手法，以及细腻独特的艺术思想——更主要的是，余艳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深深地走进了另一个女性的情感、心胸，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杨开慧是伟大的，她对自己的丈夫爱得深如海，支持他的革命事业，直到最后，敌人用暴刑逼她与毛泽东公开离婚时依然坚持不从，一直到血洒刑场，壮烈牺牲。杨开慧是有情有义的，这份情意让毛泽东为“失骄杨”而痛苦不已。

“今生今世，因你而生；今生今世，以你为荣；今生今世，为你而死；今生今世，死也无憾。”

杨开慧怀着对毛泽东的这般感情于1930年11月14日，壮烈牺牲于长沙识字岭。在临刑前，她留下了两句遗言：“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我死不足惜，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余艳在总结作为妻子的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爱情时用了两句话：

用鲜血浇注对理想的无私和忠诚；
用生命托起对丈夫的希望和信赖。

这是一个湘妹子对另一个湘妹子超脱了革命爱情的理解，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更加敬仰她们。

写《板仓绝唱》是要有许多勇气的，对一个领袖的爱情说三道四，而且要对人们脑海中已经形成概念的说法进行颠覆性的论述与评价，这尤其需要勇气。但余艳做到了，因为她有杨开慧的万言“绝唱”为证据，这是一种极有说服力的“报告”。其次，作者以一个女性的心理，走进了另一位失意的女性的内心世界，进而分析和解释这份“绝唱”，所以比一般的理解和解释更具合理性、同情心。作者时而摆脱了理性的控制，让真实的情感奔腾翻滚，时而又以冷静高远深刻的理性，让奔腾翻滚的情感波涛有序而合理地顺着一个正确的方向流淌，对杨开慧感情世界的复杂性、多义性、深刻性、全面性有了整体的把握。主人公感情与作者自己感情的相互映照，达到了女性的纯尚之美。这部“绝唱”因此成为了余艳和杨开慧两个湘妹子共同的心声与呐喊。

在日常和平凡中积蓄力量

——读谢帆云《雪山铭》

□李洪华

在《雪山铭》中，谢帆云似乎在故土真情之外有了更深层次的表达企图。《雪山铭》在抒情方式上采取了先抑后扬的策略，先写了对雪山的“轻慢”，因为它“总是卧着”，没有大山应有的“海拔”，“就是一棵树、一朵花，/只一个春天就站上了它最高的峰顶”。接下去，情感走向发生了斗转，“七千万年一动不动”的雪山“一直在积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让它的一代代子民安居乐业，适得其所。本诗的结尾让人感到了出人意料的精神， “当然我不敢保证以下的情形没有发生过：/万物沉睡的黑夜，雪山站起来/重新排列星星，那些/在山里走着走着忽然就走走了的人，/其实是被留在了天上。/我因此坚信，一座一直站着的山，一座拒绝泥土和野花的山，/是可耻的。”很显然，这精彩不只是来自诗人想象的奇特，更来自其哲理蕴含的深刻，诗人在最后完成了对雪山精神海拔的重构。

谢帆云用《雪山铭》来命名他的诗集是有他不言自明的用意的。《雪山铭》所积蓄的感人力量除了来自上述山川大地及其蕴含的哲理意味之外，恐怕与其笔下的故里人物及其更深广的忧患思虑密不可分，其中《我放的牛丢了》《我想切开大海》《舞狮尾的人》等诗作给人印象深刻。诗作《我放的牛丢了》由一头牛的丢失，衍生出

青草的荒芜、犁铧的锈蚀、耕地的寂寞、稻谷的歉收、乡村的萧瑟，取材虽为日常田间劳作物件，命意却关乎乡土文明衰退大旨，可谓言近旨远，思虑精深。此外，该诗值得重视的还有表现手法的别致，题目虽为“我放的牛丢了”，但全诗却不聚焦于“牛”，而是用传统国画中的“皴”法，多在四周着墨，让中心留白处神韵自显。《我想切开大海》是本诗集中最具冲击力的作品。表面上看来，作者是在自怨自艾地叙述一次孩童意外溺水事件，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围点打援的抒情策略，在看似克制的叙述背后实际上积蓄着难以抑制的冲击力量。一次偶然溺水事件的背后不正是6个鲜活生命逝去的悲痛，更透露出令人惊战的乡土危机。

诗不只是情感，更是经验，是个体对于世界的独特的生命感悟。经验常常意味着一个人的内心深度，而深度才是理解万物的前提，才能与生命达成和谐与默契。谢帆云诗歌中的感染力正是来自诗人对山川大地和故土风物融合而成的生命经验。真正的好诗，是在穿越人类的经验、情感、记忆以及想象和梦境，一路向我们走来的，它最终抵达的是灵魂。当庸常的俗世生活麻木了我们的神经时，谢帆云却在那些平凡的生活场景中，发现了新的秘密，并把它们从蛰伏中唤醒。

的温度。他这样描绘都市，“二胡拉扯着/方的广场和长的巷子”，“疲惫的雕塑席地而坐一言不发”，“一只忘了红绿灯的易拉罐/不断地向前滚爬/一路哼唱”……然而，即便甚至地上，即便红尘滚滚，苏忠还是坚持自我，“在酒色财气蒸腾的城市/我是一座行走的寺院”。的确，白衣飘渺的诗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洁度的高标，他们脚踏物欲的河流依然迎风吟唱，在红尘都市中寻觅不休、修行不已。

诗歌不同于小说，它是片段式、瞬间的呈现，是24分之一秒的定格，是情绪的喷薄爆发。虽然没有具体的人物、事件可以附丽，但诗人的情怀与审美品格，仍在对汉语的自由调度中坦露而出，诗人自身的形象最终也在诗中清晰地浮现出来。

诗以情动人。苏忠的诗，有的静谧安然，有的激情满怀，动静有致，显示出充沛而深沉的情感。如《青麦》：“饮饥渴的眸/大雨倾盆的光/闪电照亮了来时路/被踩疼的看不清的无数的你/肋骨串成的陌路参差/宿鸟盘桓莲花/呼喊声中红颜纷飞”，写出了青春的激情和痛楚。《夸父逐日》则以勇士的决绝与悲壮写出了崇高敬仰的情感，《来生作业本》是对故乡现在与未来深深的忧虑。

苏忠的诗，是他对生活的感受和回忆，是他对自然与生命的真诚参悟，一页页诗篇连缀成一颗晶莹美好的诗心。苏忠诗歌的诗意指向，让人领略美好与安宁，犹如徜徉在山谷，清新而洁净的风一次次净化和洗礼人们的心。

书评·作者与读者的中介

□金宇澄

■关 注

当小说编辑20多年，一直也是个中介，一个联系“读者与作者”的所谓中介。

这些年来，小说的同质化现象很明显，很多来稿，如果盖去了作者的署名，它们的语言、叙事、内容是一样的味道。在我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的写作，更在乎表现种种实验，而现今的写作已不大在乎了。我对作者说：“你们的打扮很不一样，文字却很一样，如果喜欢写作，穿衣服是次要的，文字特征很重要。”也就是说，稿件的个性识别度很差，我打过一个比方：我们如果是画家，发现自己跟别人画得一模一样，肯定是吓坏了。

有时我会问作者，小说已经退守到“故事完整性”的地步，是不是影视介入的原因？我们都知道，好小说和好剧本完全是两码事，这也是很多好小说拍不出好电影的原因。有时也提到一些具体内容，比如“文学对语言造成影响”的概念，比如“文学开拓了语言”、“大民族语言的小民族化”、“作家必须创造自己的语言”、“迫使语言脱离它的轨道”、“生成过程中的句法”、“让句法超越极限”、“语词的音乐感”、“风格是作家排除与读者之间种种壁垒的一种能力”、“最高成就是与读者发生密切的联系”……这些都是批评家曾经提到的，我这样讲来讲去，为的是与作者进行沟通。

一直沟通，一直怀疑这种沟通，如今的作者，还会在乎这些内容吗？还需要这样来要求文学吗？读者会以这样的角度阅读文学吗？批评家是否还注意这类问题？即使作者还有兴趣，批评家有没有兴趣？读者有没有兴趣？我这个角色，是否还合适？这些要求，是否早就过期了？我这种读者与作者的中介，是不是笑话？我的背后，真的拥有很多读者吗？他们接受我这样的代表吗？我能代表如今的读者吗？

当下小说有没有问题？炒冷饭问题、通俗化问题、类型化问题、走新闻路线的问题、翻译腔问题、文艺腔问题……问题好像很多，好像也毫无问题，我一直在考虑，我们现在，是否还需要文学编辑这种中介，我能以怎样的文学标准来说话？能够代表什么？代表作者，还是代表读者发言？

读者的变化是什么？他们的现状，他们的阅读脉搏是什么？编辑怎么来判断一个稿子，坚持所谓的立场，了解作者与读者的需要？我很佩服的同行——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在作者面前，他们同样代表了读者，把守一种立场，或者放弃一些立场，同时，也代表读者，判定是否可以出版，选哪几部出版。评估一个作品受欢迎的具体程度，评估它是否可以读着喜欢、与杂志编辑比较，他们显然有更大的决策风险。我的问题是，如果他们判断准确，他们所代表的写作，代表的阅读，是否真就是文学的标准？

回到题目本身，这些问题，是否是中介的问题，也就是评论的问题？目前的大多数书评还没有获得有效的中介手段，取得更多的作者与读者的沟通，没有可信奉的权威书评，评论界在一个固有的氛围中，在稳定的思维里徘徊。小说有同质化现状，批评也有这样的现状。面对出版、面对读者与作者，并没有出现一种合理的应对，一种细致的研究与兴趣，一种举重若轻的、足可以沟通的、积极的中介意识，对于当下读者的脉搏，没多少感觉。按照一般的想象，他们应该处于更高的位置，担当一种识别与促进的职能，对于编辑、读者、作者，给出可以借鉴的价值观，引导写作、阅读的中介力量，形成一种桥梁的作用。

因此，建立专业的、独立的书评中介，建立一座读者与作者之间真正的桥梁，按目前的状态，还有一段摸索的路要走。